

# 塑造与泯灭的互文阐释

## ——《约伯记》与《修道士》魔鬼形象比较

孙 慧<sup>1</sup>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约伯记》和《修道士》两部作品中的魔鬼, 都以其生动鲜活的形象极大地丰富作品内涵。在文本内容层面, 魔鬼可鄙地诱惑甚至戕害被世人推崇的义人。然而在思想层面, 魔鬼对宗教与道德准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恶”对“义”做出更全面的补充和诠释。

**关键词:** 魔鬼; “义”; 《约伯记》; 《修道士》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约伯记》和《修道士》中的魔鬼立场鲜明, 以阴险狡诈面孔出现, 行事诡秘而残酷。文本里这些存在于天地缝隙中虚无缥缈的邪恶精灵, 成为一切罪恶的始作俑者。魔鬼的邪恶来源不详却目标明确, 它及其行为、行为后的结果被视为受诱惑者犯错或可能犯错的主要诱因。在这种环境设定下, 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不可避免地成为多种神秘创造力下微弱如蝼蚁的对象。然而细察则不难发现, 在魔鬼故事中被过分妖魔化后产生的矛盾始终是作品正面精神的重要助推力量。

### 一、圣哲思想的镜像追踪

从远古时期人类就开始寄期望于占卜、祭祀等巫术活动以逃避恶鬼邪神; 中世纪神学创造魔鬼之具体形象并明确将其摧毁, 匡扶宗教所推崇的唯一义神; 现代伦理学则试图以科学的方式阐释并解构魔鬼之“恶”。人类始终不断地努力消除恶, 试图挽回恶给人们造成的伤害。想要做到这一点, 势必要从根源上充分认识并掌握恶, 因此将“恶”凝结为一个明确可感的对象就显得尤为必要, “魔鬼”角色便应运而生。

在众多魔鬼考验类故事中, 人类和人不可遏制的世俗化欲望在不断上演思想

---

**作者简介:** 孙慧 (1989-), 女, 河南郑州市人, 河南大学文学院 2012 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争夺战，这种斗争的延续性和恒久性在文学人物中一代一代地传承顺延，在不同的故事和形象中变异再现。与魔鬼相对，在现实中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长久以来承担上帝于人间所造典范之责任，成为世人趋于真、趋于善、趋于美的现实指引。亦基于这层原因，文学作品中的后者往往成为前者挑战正义的突破口，首当其冲受到各种诱惑，稍有不慎就被地狱的火舌吞没。《修道士》中犯罪前的安布罗斯就是人们眼中这类人的最佳代表，其高尚的品格和正派的作风更是令四周拜服。然而魔鬼的奴仆马蒂尔德深谙安布罗斯彼时对名誉声望的倚重心理，将安布罗斯推上道德的制高点，俯视自己以松懈宗教道德所带来的警惕：“我把您视为一个圣人，而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否则我会讨厌地离您而去。您担心诱惑来自于我吗？噢！消除这些不必要的担心吧，因为您知道我鄙视尘世的欢乐！把我想得高尚些，把您自己想得高尚些。我根本不能诱惑您犯罪，因为您的德行稳如磐石，任凭风吹雨打不可动摇。”<sup>[1](P54)</sup>她的巧舌如簧和对对象心理的准确把握最终使安布罗斯缴械投降。无论何时何地，道德既是为圣能贤士带来荣誉的勋章，也是考验其品格心志的试金石。《圣经》中，对上帝虔诚顺服的约伯亦面临人格乃至生命的挑战。《约伯记》一开始，全知叙述就提出义人约伯正直忠诚，他的善更被上帝所认同。而在这时，往来于“地上”（人间）的撒但提出潜藏于虔诚层面下的一个命题——义人敬畏、信仰上帝是否没有缘由。“在复杂的人类生活的转动装置中，我们必须找出使我们的整个思想和意志机器开动起来的隐秘的传动力。”<sup>[2](P30)</sup>质疑的提出，关于“义”的相关问题浮出水面并得到逐步深入的讨论。站在约伯所代表的“义”的对立面，撒但开始对约伯的宗教信仰加以剖析、探寻。

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创造性文化成果，具有较强的普世价值。然而意识形态却总是摆脱不了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并不总是令人欢欣鼓舞。《修道士》中安布罗斯以占有道德、名誉旨，却被以名誉作为诱饵的陷阱引向道德的深渊，是因为他此前不曾发觉自己维护名誉的动力是虚荣心而非道德。《约伯记》中约伯饱受折磨，因而义人也变得言语急躁、愤世嫉俗，怀疑自我和命运。在“魔鬼引诱”型故事中，原本单向平稳的思维模式在魔鬼所代表的世俗化力量的合力作用下，往往向着一个似乎极其危险的方向疾驶，而道路的方向实质上则是人物自身的性格倾向。在义人与上帝的二元关系中，普遍精神价值评判下的个体被单一的宗教动力驱使，完全呈现自身保有的义。随着“魔鬼”这一外来因素的介入，纯粹的二元平衡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在这种新的关系中，处于底端的人的意识被重新发现，从而开掘出从未表现出的陌生心理状态。因此，原本绝对的“义”中滋生出的邪恶或浮躁，事实上是头脑风暴后意识全面觉醒的全新结果。

## 二、需求规则的威严卫道

在宗教世界中，神及相关的一切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神和人的亲疏距离直接影响自身命运、与周围他人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这种特定信念造就了群体性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状态下，人的行为选择总是受到整体文化氛围的影响。因此在宗教环境中，上帝成为需要完全投身的对象，义人必须放弃自身主体性以实现绝对信仰。与之相悖的是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个体，势必不能完全消除与生命共同存在的自然属性，因而其自身的物质欲望与感性欲望无时无刻不在参与人的生命活动。

西方文学作品中，魔鬼往往穷凶极恶地出现，试图激发甚至培养受考验对象的违背宗教本旨的人性原欲。这样的诱导对具体对象的原有世界观往往造成巨大

冲击，这种力量在《修道士》和《约伯记》中都有充分的展现。《约伯记》中约伯丧失财产、痛失儿女甚至身体饱受摧残，却仍“不以口犯罪”。就在上帝以他为纯正之际，撒旦道出对人性剖析的经典论断：“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sup>[3] (P427)</sup>第三章后约伯的消极情绪便较为明显的表现出来：诅咒自己的生命、埋怨自身命运，甚至诅咒光明、召唤黑暗，对一切现存事物报以哀忿。与约伯消极求死相对，《修道士》中安布罗斯当自己的罪行被揭穿、即将面临死刑之时，选择仓皇应允魔鬼的要求以保全自身性命。不论是对神虔诚恭敬的约伯、还是虚荣自傲的安布罗斯，都对来自对生命的威胁感到悲愤与恐惧，而这种最原始的恐惧又直接或间接与魔鬼相联系，义人亦因此蒙上恶的阴影。

现代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两大部分，并将这两大部分细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对认识 and 理解的欲望和对美的需要七个层次。生理作为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承担自我生命调节的主要职责。“我们这个社会中有很多人，他们的绝大多数基本需要都部分地得到了满足，但仍有几种基本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正是这些尚未得到满足的需要能强烈地左右人的行为”<sup>[4] (P49)</sup>不论体现本能欲求的因素是自然还是超自然的，作为生命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因素既已出现便应受到足够的重视。魔鬼作为深谙此法的人间窥测者，在言行举止间自觉成为拥有独立位格、代表着人类基本需求的特殊对象的同时，也成为人类精神深层暗藏的自然属性的化身。

如若恣意追求代表着自然属性的基本欲求，则是对马斯洛理论的片面化误解。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的综合个体，也同样充分怀有精神理念的需要、亦是主流宗教所推崇的最高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在马洛斯的需求理论中，自我实现被称为“超越性需要”。无论是自然欲求还是精神提升，都是人类需求的题中之义，两者缺一不可。《修道士》中安布罗斯开始保有良好的声誉，成为全马德里的精神领袖，这显然已经非常接近人的精神上较高形态的需求。但是由于从小在修道院长大，缺失对爱和归属的满足，因此在遭遇魔鬼派来的诱饵马蒂尔德的诱惑后，不顾一切投身于爱欲的放纵中。这是由于安布罗斯个体本身缺失了爱的满足，最终造成他在肉体与精神两者的鸿沟间失足陷落。而《约伯记》中约伯原本是“在东方人就为至大”的倍享鸿福之人：儿女众多、奴仆成群、田丰畜肥，他的追求唯剩感激神的封赏和向神昭示自身虔诚。对于约伯的追求契合了人类的基本需求规律，因此在实现尚未企及的超越性追求时，丧失已拥有的前者固然令其痛心疾首，却不会改变约伯追求精神超越的生存初衷。

两个故事都包含生存需要在某一环节缺失的情节致因，与其说魔鬼的出现是对义人薄弱环节的疯狂挑战，不如说是对人类自然需求与精神追求两者的道德度量衡。它坚守人们在正当追求和无道纵欲之间的那道鸿沟，不易觉察地筛选、指引通往终极关怀的芸芸众生。

### 三、否定之否定的契约审判

在西方主流宗教观念中，契约是神人联系的关键枢纽。“就算在最为落后的社会中，法律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成为一种纯粹的表层的东西，在它下面，有一种不停地变更着的契约性的规定的集合”。<sup>[5] (P383)</sup>希伯来文明中，契约观由依赖所萌生的信仰出发，在明确的宗教观念形成后衍变成犹太教神人关系的关键枢纽。在《圣经》中耶和华先后与挪亚、亚伯兰和摩西立约，以色列人以此认定自

己民族是上帝所拣选的尊贵长子。与上帝形成对照，魔鬼也总是以带有契约性质的形式与人类产生相互关系，从而近距离参与人的现实和精神生活。“早期基督教教父们尽管从使他们感到眼花缭乱的文化中吸纳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但他们仍急于将自己与‘异教徒’的信仰体系区分开来。他们教导说，所有异教徒的宗教都是由对鬼和人的崇拜思想组成的，在这些宗教的思想中都将鬼和人误解为神。”<sup>[6] (P129)</sup>因此，宗教观点认为，魔鬼作为上帝神性的异端衍生物站在善与义的对立面，处心积虑破坏原本亲密的神人关系，散播不正当的生活理念与方式。

《修道士》中安布罗斯为了避开埃尔维拉的提防，决定借助魔鬼的力量于深夜潜入安东尼娅的房间。他忌惮这种神秘的黑暗力量，然而他安然作恶的最终原因是他以前了解到，魔鬼无法得到未完成协议的灵魂。这种或口头协定、或书面记录的约定，成为西方传统中人与魔鬼暂时合作的依据。《约伯记》中，神的虔诚子民约伯作为宗教信仰的杰出代表，象征着宗教教化的最终目标。处于信仰坚定且纯粹的以色列民族，约伯的最高理想表现得高度集中化——即便在困境中亦绝不抛弃神祇信仰的民族精神内质，始终坚信自身与神所立契约力量的存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宗教性往往突出体现在向外界呈现出普世性的契约特征，而上帝之义与魔鬼之恶作为宗教道路的两个端点，共同构成告诫信徒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准则。这种宗教理性主义与社会伦理道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共同指向宗教认知和生存实践的统一。

如上所述，魔鬼借助契约的方式加入人类的道德评判，然而这种参与并不与上帝至高、至善的原则相悖。《修道士》中满载盛誉的安布罗斯受到马蒂尔德的诱惑和怂恿看似为不慎失足，然魔鬼最后忿恨指责一语道破天机：“我本就知道你的美德和操行是出自虚荣而非内心认识，而我就抓住了你这个受诱惑的恰当时刻，我观察到你对圣母像的盲目崇拜，我就让我下面的一个狡猾的幽灵装成她的样子，而你就急切地陷于马蒂尔德的奉承之中”<sup>[7] (P382)</sup>延宕多时的真相终于得以大白，安布罗斯的堕落源于其内心的邪欲，他的毁灭亦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整个堕落的过程中，魔鬼仅是提供了诱惑的可能和当事人犯错的方法和途径。如果说《修道士》中的魔鬼尚可视作识别、铲除奸恶的精神清道夫，那么从文本层面上看，造成义人约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撒但一定被划为居心叵测之列。然而从劫难的整体角度出发，约伯的磨难只是在完成所有基本需求后，向人类最高目标晋升过程中经历的挫折式考验。魔鬼严格遵循耶和华的嘱托，只磨练其心志而不夺其性命，充当着约伯最终受信得道的不可缺少的助推环节。

在上帝与人的契约中囊括了神所属意于人的应做之事，而魔鬼则承担验证此中品质的责任。“事实上，诱惑的最终根源在于天主赐给人的自由这个恩宠。自由的恩宠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受诱惑与犯罪的危险，但同时，自由又是人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必要先决条件。”<sup>[8] (P351)</sup>在因循神的旨意寻求精神超越时，物质发现无时无刻不在干扰人们的精神超越。因而义人在历经诱惑乃至劫难后，仍保有对否定精神皈依事物的抗拒态度，才能最终完成“义”的到达。

两部均含有魔鬼参与的故事，在这一特殊形象的干预下指向了截然相反的结局。然而无论是《约伯记》中义人得道亦或是《修道士》中恶人受罚，都集中体现了魔鬼作为神人交感互通的见证和特殊媒介，从人类历时经验的角度，质疑理想的普遍正义论，却并不违拗神向人传播的价值立场。“更进一步来说，罪恶使美德更有价值。如果无人走上歧路，就不会有人孜孜不倦地寻求正道，从而使善失去价值，使责骂和赞扬毫无意义。”<sup>[9] (P242)</sup>魔鬼专注于将人、尤其是贤者义人的

人性缺陷置于上帝的目光之下，成为惩罚奸恶、伪善的坚定卫道者。它将用强劲而神秘的动力将人置于生存危机中，全知审视一切善与恶，以残酷泯灭邪恶，用诱惑铭记善良，凶煞地表达着信仰选择和“终极关怀”的内在联系。

#### 参考文献：

- [1]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 修道士[M]. 李伟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第 54 页
- [2]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第 30 页
- [3]圣经（和合本）[Z].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 第 427 页
- [4]弗兰克·G·戈布尔. 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M]. 吕明、陈红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第 49 页
- [5]亨利·萨姆奈·梅因. 古代法[M]. 高敏、瞿慧虹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第 383 页
- [6]卡尔·萨根. 魔鬼出没的世界[M]. 李大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第 129 页
- [7]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 修道士[M]. 李伟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第 382 页
- [8]白舍客. 基督宗教伦理学[M]. 静也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第 351 页
- [9]保罗·卡鲁斯. 魔鬼史[M]. 王月瑞、刘静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第 242 页

孙慧 河南郑州人，河南大学2012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邮编：475001

电话：15093620869

E-mail: [sunhui5532@126.com](mailto:sunhui5532@126.com)